



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遵义会议最大的历史性贡献

李君如

我们即将迎来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党和红军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可以说,这是遵义会议在党的建设历史上的最大贡献,也是遵义会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赢得最后胜利的最大贡献。

A 党对遵义会议历史地位历史贡献认识的深化

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已经做了结论。从这三个历史决议中,我们可以注意到,都充分肯定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贡献,但论述的内容、要点和强调的意义又各有特点,体现了党对遵义会议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

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是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在阐述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贡献时,指出:“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张国焘路线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个决议的要点有四:一是指出了遵义会议在红军长征途中最危急关头结束“左”倾路线、挽救党的历史性贡献;二是指出了遵义会议在当时只能先纠正“左”倾路线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三是指出了遵义会议对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长征胜利和推动抗日战争爆发的历史性贡献;四是特别指出了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是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在阐述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贡献时,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个决议和第一个决议相比,有三个亮点:一是遵义会议不仅是在红军长征途中“最危急的关头”召开

的,而且强调“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二是遵义会议不仅“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而且强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三是强调遵义会议不仅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推动了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且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是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在阐述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贡献时,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个决议和两个决议相比,亮点有三个:一是不仅指出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且强调了三个“挽救”,即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二是不仅突出了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且“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

由此可见,这三个历史决议对于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的认识是在不断提升和深化的,这种认识的提升和深化集中在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历史贡献的认识上。第一个决议指出“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第二个决议指出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第三个决议强调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显然,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在长征途中最危急关头结束“左”倾路线,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根本原因,也是遵义会议最大的历史性贡献。

B 邓小平关于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的确立及其对遵义会议意义的论述

研究党对遵义会议历史地位历史贡献认识的深化,必须指出,把“开始形成以

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为遵义会议最大的历史性贡献,是邓小平提出和强调的。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他明确指出:“关键在领导核心。”“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接着,6月16日,他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通过对党的历史经验的回顾总结,鲜明地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人组成的常委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核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

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党要有一个“核心”这一重大问题,而且明确指出是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C 从遵义会议认识“核心地位”的科学内涵

那么,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什么叫作“核心地位”?研究遵义会议的历史,可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按照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一权威文献所陈述的,遵义会议通过的决定,第一条就是“毛泽东同志作为常委”。遵义会议后在对常委分工时,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于当时党的领导主要是领导军事斗争,毛泽东由此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并承担起军事指挥的领导任务。重要的是,遵义会议后,军事上的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带领其他成员作出的,不久便扭转了中央红军被动的局面,最终赢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所以,我们一讲到遵义会议就会一致认为,是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而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之所以能够在遵义会议上获得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赞成和拥护,一是在实践中大家已经看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二是毛泽东在红军途中已经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团结了大多数;三是毛泽东在会上的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及以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得到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赞成。由此可见,“核心”之内涵,一是能够顺从和代表党内正确的意见,二是能够团结领导集体中的绝大多数同志;三是能够在极端复杂的形势下

为党指出正确的方向,提出正确的路线。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在阐述党的历史及其丰富经验的时候,没有使用过“核心”这一概念,我们使用得比较多的概念是“领导地位”和“领袖”。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他说:“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他在论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伟大领袖”的时候,用了党和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等等。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阐述了“领袖对于党的作用”,并引用了列宁关于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论述,强调“这种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这些关于“领袖”和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的论述,告诉我们:作为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一能够忠实代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二能够广泛团结和组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三能够为党和人民指明正确的道路。

综上所述,对于什么是“领导核心”问题,尽管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要求,但其基本内涵始终是忠于党和人民,团结党和人民,引领党和人民走向伟大胜利。

D 简短的结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我们今天研究遵义会议对于确立毛泽东在中央核心地位的现实意义,就是要从政治与思想、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攻坚克难,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

党的二十大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以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这样的权威形式,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最紧要的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可见,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更加自觉地承担起“最紧要的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步调一致向前进。”

选自《学习时报》

数字技术赋能城乡融合发展

颜廷武

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并向乡村广泛渗透,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搭起一座“数字桥梁”,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动能。

城乡融合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发展过程,涉及城乡功能布局、要素流动、公共资源配置、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诸多方面。当前,城乡要素难以顺畅流动,特别是乡村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过多流向城市,普遍被认为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障碍。数字技术的应用深刻改变了城乡互动模式,以及传统的生产要素流动与空间配置路径,能够促进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同时,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以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有利于提高农业要素配置效率。

通过高效的信息流通和精准的数据支持,数字技术能够促进农产品供需有效对接,将乡村市场融入统一大市场;同时也能促进城乡产业协作与价值链双向延伸,从而实现城乡经济的互补发展和深度融合,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在促进城乡公共资源优化配置方面,数字技术也发挥出重要作用。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突破传统的时空限制,其与教育、医疗、就业、文化等公共服务供给的融合发展,带来“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场景创新,促进了城市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下沉,提高了公共服务资源覆盖面和均衡普惠度。

数字技术在提高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水平方面也有积极的作用。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城乡之间的信息、管理和服务实现实时共享,让治理的过程更加透明,提升治理效能。

在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制度建设对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保障作用需要加强。目前在城乡数字化治理过程中,相关制度规范不健全引发数据过度采集、数据处理不透明等问题,需要加强制度建设,确保数字技术更好赋能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鸿沟、数字不公平等问题亟待解决。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不少农村居民缺乏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如何在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产业发展效率、社会治理效能的同时确保公平,依然是其中一个重要挑战。

数字技术在给城乡发展带来高效、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风险。特别是农村网络安全方面,如果缺乏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农村地区可能面临信息泄露、网络诈骗等风险,对此要做好防范应对。眼下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冷静分析数字技术的应用方式、范围,瞄准城乡融合发展的短板弱项,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突破。

在促进城乡产业跨界融合升级上下功夫。城乡融合发展,产业融合是基础。要深化数字技术在工农业生产领域的应用,特别是推动数字技术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领域的普及应用,促进农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的数字化、智能化和高效化,提高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加快县域商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乡镇快递网点数字化改造,促进城乡生产、流通、消费有效衔接。

依托数字技术带动更多要素向乡村流动。城乡融合发展,突出短板在乡村发展不充分,关键制约是现代要素保障不足。要积极培育乡村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发展乡村智慧旅游、创意农业等新业态新模式,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向乡村汇聚,加强乡村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吸引更多的数字经济相关人才入乡创新创业。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因地制宜打造普惠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

把提高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放在重要位置。公共资源配置直接关系到城乡居民福祉,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要构建城乡一体化数字化规划平台,提高规划的精准性和科学性。推动公共服务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培育“互联网+养老”等多样化场景,促进优质公共资源城乡共享,提高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效率。

还要看到,城乡融合发展既要“硬联通”,更要“软衔接”,依托数字技术提升城乡治理融合水平是重要内容。可以借鉴“数字乡村一张图”和“数字大脑”等经验,打造城乡一体化的数字治理平台,建设覆盖全生命周期、线上线下联动、精准高效的数字化治理网络,不断提升城乡治理效能。



观点 聚焦

切实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

政治监督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障。在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上下更大功夫,以具体求深入。政治监督具体化重在“做实”,防止泛化、虚化、口号化,对监督的任务、对象、内容、标准要明确具体,对监督谁、为谁监督、监督什么、怎么监督要做到心中有数。

在推进政治监督精准化上下更大功夫,以精准求实效。落实精准化要求必须抓住监督要害,要聚焦重点岗位、重点领域、重要工作、重要环节,着力发现和纠正思想认识、政治态度、落实行动中的偏差。紧盯重点人重点事精准发力,聚焦“关键少数”,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的政治监督,聚焦重点领域,特别是人民群众关注和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监督。

在推进政治监督常态化上下更大功夫,以常态求长效。要把政治监督作为经常性工作,在日常监督中找到落实落细的有效载体和具体抓手,健全闭环落实机制,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清单管理,常态化开展落实情况“回头看”,不断丰富政治监督的方式和手段,确保全面落实、精准落实、高质量落实,以常态求长效、以长效促长治。

陈银健 光明日报

统筹推进算力一体化建设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前不久表示,将加快制定算力互联互通、算力市场培育等行动方案,建立健全算力网络协同发展的标准规范体系,增强算网融合能力,加速构建全国统一的算力服务大市场。算力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支撑,也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动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进一步发挥算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要创新驱动算力技术,加快突破瓶颈;加强多元泛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形成算力服务统一大市场;推动算力绿色节能低碳发展,以技术创新解决算力高能耗问题,控制住算力能耗高速增长势头。

王琛伟 齐丕明 经济日报

欢迎赐稿

“理论与实践”投稿邮箱:gyrbll@163.com。欢迎来稿,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推动“端菜文化”研究走深走实

周木槐

具体的、现实的。”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时想到国家,处处想到人民,做到‘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个人命运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表明,践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要将爱国主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爱国,尤其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李端菜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者。甲午中日战争后,他清醒地看到中日之间的差距是导致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根本原因。中日之间的差距在哪里?在教育!对此,李端菜忧心忡忡,心急如焚。要改变现状,必须走教育救国之路,随后他向光绪皇帝奏《请推广学校折》。对学校教师而言,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务必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自觉抓好师德师风建设,让每位学子获得自由而充分的发展。

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端菜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贵州民族文化中的一朵绚丽的花朵。倡导改革创新,是“端菜文化”的鲜明特质。李端菜的《请推广学校折》,对近代中国的教

育改革与发展做了全面的思考、精心的设计。饮水思源,北京大学能有今天的发展格局,贵州师范教育能有今天的发展规模,我们不能忘记李端菜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就是要贯彻落实好《决定》提出的“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结合实际,推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一系列举措,真正实现教育事业的跃升和质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全方位的人才支撑、智力支持。

推动“端菜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取得更多成果。《决定》提出:“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深化文化领域国资国企改革,分类推进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完善文艺院团建设发展机制。”当前,参与“端菜文化”研究、建设与传播的社会力量主要涉及到五个方面:一是高等院校的专业教师与研究生;二是社科研究机构与文史研究馆的专业研究人员;三是教育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和中小学教师;四是离退休的文史研究人员;五是

文化演出机构。上述人员在“端菜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譬如:贵阳市南明区永乐中学的“李端菜纪念馆”自开办以来,已接待了数以千计的参观者;贵州京剧院编演的新编历史剧《黔人李端菜》,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演出,获得空前成功,北京日报、人民网的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端菜后学”概念的提出,有力地推进了“端菜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在时间、空间上拓展了“端菜文化”的研究范围,在研究对象上拓展了“端菜文化”的研究领域。2024年出版的《“端菜后学”研究——以李端菜与梁启超的交往关系为中心》,入选了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光明文库”。一系列的成就表明,在“端菜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还有许多方面有待挖掘,还有大量工作亟待去做。我们相信,推动“端菜文化”研究范围、研究对象上取得更多成果,进一步讲好“端菜故事”、传播好“端菜声音”,让更多的“端菜文化”成果直达学校、企业、机关和农村,一定能更好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更加有力地助推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建设。

(作者系贵州省史学会副会长、贵阳学院李端菜研究院院长)